

《黃帝陰符經注解》等；集部書籍有《楚辭集注》、《晦庵先生文集》等。“延平四賢”，特別是朱熹，其著述能成一家之言，因此而能在福建廣聚生徒，問答辯，弘揚學派，形成重大的學術影響。其門人後學，在他們的啓發下，也紛紛著書立說，宏揚傳統文化。如：蔡元定著有《易學啓蒙》、《洪範解》等，楊復著有《儀禮經傳通解續纂祭記》14卷、《大學中庸》、《論語問答》、《詩經雜說》等，楊與立著有《朱子語略》，廖德明著有《文公語錄》等，劉燾著有《易經說》、《禮記解》、《四書集成》等，林用中著有《東屏集》，林子武著有《尚書本義》10卷、《中庸章句》、《蒙穀集》等。“延平四賢”還積極興辦學校，聚徒講學，培養人才。如朱熹在同安任主簿時，就“以教養爲先”，積極開辦縣學，所設縣學分爲“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朱熹

“選秀民充弟子員，一時從學者衆。建‘經史閣’，作‘教思堂’；訪求名士徐應中、王賓等以爲表率，日與講論正學，規矩甚嚴。”（吳錫璜：《循吏·主簿》，《同安縣志》卷35，民國版）

朱熹還倡立書院，他親自創辦或講學的有28所，在福建境內就有15所，其中有名的就有武夷精舍、考亭書院等。

楊、羅、李、朱以其淵博的學識和不倦的誨人精神，

通過興學校、建書院，延納四方門生，成功地開展了一代又一代的私人講學活動，不僅促進當時福建地方的文化傳播，而且對後代書院制度的發展和自由講學風氣的提倡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福建經南宋，歷元、明至清，各縣普遍設立書院，于官學之外另闢教育陣地，在培養人才、研討學問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楊、羅、李、朱在講學中，循循善誘，表現了誨人不倦的精神。楊時諄諄教導羅從彥，既要重視“爲學之方”，更要懂得“學成要何用”，“要博通古今文章”，“不爲非正義之士”。（《楊龜山集·語錄》）讓羅從彥明確學習目的，掌握學習方法。羅從彥教育李侗祇要在“性地栽培”中開始就謹慎于“是非理欲”，並用心讀“誠明靜定之書”，注意“用心靜處尋求”，就會于“道”上得“融釋”，達到孔子、顏淵等聖人的境界；勉李侗：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或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豫章文集》卷17《詩文·勉李願中》）李侗對朱熹“祇教聖賢言語”（《朱子語類》卷104），終使其完成閩學體系的建構。朱熹在教育弟子方面，也是誨人不倦。黃幹說他“講論經典，高貫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以爲憂。”（《黃勉齋集·朱子行狀》）

朱熹在治學中，主張要先立志，並自覺積極地去學習。

“學者要立大志。所謂立志……祇是直截要學堯舜。”（《朱子語類》卷11）“學問，無賢愚，無大小，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的事。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着得力”。（《朱子語類》卷10）“看文字，要聳起精神，樹起筋骨。”（《朱子語類》卷10）

提倡循序漸進與熟讀精思相結合、“窮理”與躬行實踐相結合的學習方法。“凡讀書，須有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會上一句，待通透；次理會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曉；然後將全章反復細繹玩味。”（《朱子語類》卷11）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朱子語類》卷13）“延平四賢”培養出幾代大批名人。僅朱熹來說，其門人有案可查的著名者達500余人，散播于福建29個縣。如建陽有劉燾、蔡元定、蔡淵、蔡沆、蔡沈、劉炳；崇安有歐陽光祖、張宗說；浦城有楊與立、楊道夫、楊驤、張彥清；順昌有廖德明；同安有曾秘、許景陽、陳齊仲；晉江有傅伯壽；漳州有朱飛卿；龍溪有陳淳、黃學皋；莆田有方士繇、方壬、陳宓、黃士毅、鄭可學；寧德有陳駿、龔郊、李鑒、鄭師孟；古田有余偶、余範、林用中、林允中、林夔孫、林師魯、林大春、程若中、程深父、蔣康國；霞浦有黃尚質、林湜；福鼎有楊楫、高松；福安有楊復、張泳；閩縣有黃幹、張洽；長汀有楊方；等

等。“延平四賢”門人效法先師，著書講學，培育後人。如閩縣黃幹晚年歸裏，日夜編禮著書，講論義理，“弟子日盛，借鄰寺以處之，質疑請益如熹時。”（《黃勉齋集·本傳》）龍溪陳淳，“漳泉人士爭師之，淳講解率至夜分無倦色。”（《陳淳傳》，《福建通志》卷40）在朱熹避“慶元黨禁”時，閩東朱熹門人林用中、余偶、余範還分別主持古田溪山書院、擢秀書院、興賢書院等配合朱熹在古田藍田書院的講學，聚徒講學，各地學士聞訊負篋來讀。

在“延平四賢”楊、羅、李、朱及其門人和其他理學家的啓迪倡導下，福建文化大昌，讀書風氣濃厚。據方志記載：

宋至清，延平“五步一塾，十步一庠。家樂教子，朝誦暮習，洋洋盈耳，稱爲鄒魯之邦”。（《風俗》、《延平府志》卷1，嘉靖版）邵武“儒雅樂善，比屋弦誦，號小鄒魯”、“人尚理學，彬彬乎道德文物有鄒魯之遺風。”（《風俗》、《邵武府志》卷2，嘉靖版）

《晉江縣志》記載：

“得朱紫陽（熹）簿同（安），往來過化，海濱鄒魯之風……由來久矣！”

光澤原文化極爲落後，自南宋以來，

“衣冠文物，中州鮮與齒，蓋由西山李先生得道南之緒，大倡斯道月洲、雲崖，教育嗣布，與考亭師友濟美當世……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所致然也。”（《光澤縣志》卷首，明正統版）

尤溪原是一蠻溪獠洞，

“自大儒篤生以來，士頗知學，戶有誦，家有弦，彬彬然風雅是尚。”（《尤溪縣志風俗志》，民國版）

“延平四賢”楊、羅、李、朱重視教化，重視培養人才，使宋以來福建在文化領域各個方面，都有重大成就和突破。福建除了在哲學上產生了閩學及考亭學派外，在刻書、文學、史學、書法、科技等方面，也呈現繁榮景象。因閩學興起，福建刻書業也極爲興盛，形成獨具特色的建刻。孫敏修統計宋代有14家刻書，福建佔8家，“麻沙、崇化兩坊戶書，號爲圖書之府”，福建建陽在宋、元、明三代，均始終是全國的刻書出版中心。朱熹等理學家既是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同時也是文學家、詩人、歷史學家、書法家等。

在“延平四賢”及其門人勤耕不輟、教化培育下，宋代福建中進士者達7600余人，約佔全國中舉總數的25%，所以《宋史·地理五》載曰：“福建路登科第者尤多。”



林尚仁在《端隱吟稿·陳必復序》裏也說：“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稱七閩。”福建爲宋代全國文化水准最高的地區之一。到清代，福建舉人數達1300余人，約佔4.4%。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總之，“延平四賢”重視教化，有力地推動了閩地文教事業的繁榮昌盛。

## 四

“延平四賢”楊、羅、李、朱重視道德修養，立紀綱、勵風俗、重氣節，極大地影響了福建的社會風尚。

楊時一生尊師重道，爲官清正，爲民興利除弊，勇于彈劾權奸，忠誠正直，力主抗金。楊時從小就知書識禮，孝敬父母。幼年喪母，哀傷之情不減于成人。後奉事繼母，也同孝敬生母一樣。楊時拜二程爲師，尊師重道，提倡“踐履”、“居敬”、“窮理”等一套修身求道的方法。元豐八年（1085年）六月底，程顥逝世，楊時悲痛萬分，向各處學友發訃告，帶領學生在徐州設靈堂，擺靈位，哭悼先師。悼文曰：

“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

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言者所不能稱說也。……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有千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于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楊龜山先生全集》卷28）

表明他對老師程顥的推崇和祭奠。元祐九年（1093年）隆冬時節，他在游酢相邀下，與游酢以師禮去洛陽拜見程頤，留下“立雪程門”之佳話。他們尊師重道，“立雪程門”精神代代相傳。楊時任過地方官，也任過朝官，但一生為官清正，始終保持勤儉節約的美德，宋呂聰在《問書冊》中說：

“視公一飯，雖疏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溫袍若皆適于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敝廬優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將樂文史資料》第3輯）

他逝世時，“身後蕭然，家徒壁立。”（朱震：《故龍圖閣直學士左朝請大夫致仕楊公行實》）他關心人民疾苦，為民興利除弊。宋哲宗紹聖四年（1097年），他任濟陽知縣，值多災，他先後上書有司反映災情，為民請賑濟。由于漕使胡師文妒視安撫使張舜民禮遇楊時，以“不催積

欠”罪誣陷楊時，楊時被罷職但無憾。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楊時在蕭山知縣任上，興修水利，緩解當地積年之旱澇，使民得灌溉之利。離任後，“邑人重其名，多畫像事之。”（《宋元學案·龜山學案》）對權奸，楊時勇于挺身彈劾。北宋末年，蔡京、童貫等“六賊”把持朝政，狼狽爲奸，

“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宋史·楊時本傳》）徽宗大觀六年（1107年）楊時任餘杭知縣，蔡京“葬母餘杭，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宋元學案·龜山學案》）

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楊時又不顧個人安危，上疏乞誅童貫。當陳東率太學生與京城百姓十餘萬人伏闕上書，要求誅蔡京等“六賊”，乞留李綱，對金抵抗，而“朝廷憂其致亂”，欲行武力鎮壓時，楊時又毅然挺身而出，爲請願群眾辯護，在欽宗前直陳“士民出于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宋史·楊時本傳》）因此避免了一場血腥屠殺。可見，楊時氣節高尚，忠心耿耿，無愧爲賢者。

羅從彥一生清節自守。他除在61歲時，做過短期惠州博羅主簿外，一生絕意仕進，

“嚴毅清苦，簞瓢隱居”，“于世之嗜好，泊如也。”



（《宋元學案·豫章學案》）

他有二首詩表明心志：其一《勉李願中》：

“權門來往絕行踪，一片閑雲過九峰。不似在家貧亦好，水邊林下養疏慵。”

其二《顏樂亭》：

“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

由于他清節自守，就是在博羅主簿任上，他也是宦囊如洗。他逝世後，“喪不能還”，其靈柩爲一族人幫助護送返閩，後由門人李侗替他安葬的。羅從彥雖是一名寒士，但却從未忘記國家的安危，“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宋元學案·豫章學案》）并針對當時社會弊病，強調托古改制，

“明道以行忠義。”“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董仲舒、唐韓愈、柳宗元誇尚古文，二者漸失周孔之心，于是明道者寡，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李侗傳》，《南平縣志》卷20，民國版）

羅從彥還採摘先朝故事，以論治國，編成《遵堯錄》一書，提倡節儉，反對侈糜，要求朝廷

“憫生民之重困，發德音，下明詔，鏟除弊法”，  
“以望太平矣”。（《遵堯錄序》，《南平縣志》卷16，  
民國版）

在修身治國上，羅從彥主張朝廷要振紀綱，用人要得當，士子應正直忠厚。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必亂。”  
“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摧。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必有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奸，則外必有朱泚之叛”。  
又如：“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則入于懦”。  
（《羅豫章集·議論要語》）

對於“一國之君主”，羅從彥以爲要“明而不察，仁而不懦”，主張人君要善于納諫：“納諫之本在于先虛己”。這些都體現了羅從彥的憂國之心、愛國之心，并重視道德修養。羅從彥對師長也極爲尊敬。他曾五次受學于楊門，講學論道，相得益彰。紹聖丁丑（1097年），他

得悉伊川先生被貶而特往慰問；伊川先生因被誣貶，鬱憤而亡，其門人未敢吊喪，羅從彥則在赴京途中轉道洛陽，往伊川縣白虎山下謁掃先生墓，以盡弟子之誼，爲世人所稱道；元符庚辰年（1100年）龜山先生被誣，罷官回鄉講學含雲寺，羅從彥多次執弟子禮前往就學，且志益堅，其學亦益醇，尊師之情亦益彌。

李侗從學羅從彥，一心繼“聖人絕學”不求功名利祿。從學數年後，即謝絕世故40余年，結廬山中，過着十分清苦簡樸的生活。他盡管清貧，但却樂于助人，表現出高尚情操。

“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然。”（《宋史·李侗傳》）

李侗雖不求功名利祿，終身不仕，但他時刻關心國家命運，“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宋史·李侗傳》）隆興元年（1162年）朱熹應詔入朝奏事，行前將封事稿本送給李侗批改，李侗閱後復信說：

“今日國家所以不成事功者，正挫以和議爲名爾。”

“要之斷然不可和，自整頓紀綱，以大義斷之，以示天下向背，立國是可爾。”

并囑咐朱熹：

“吾儕雖在草野，憂世之志但無所伸，亦可早發爲佳。”（《宋史·李侗傳》）

李侗一心“繼聖人絕學”，因此師事羅從彥，“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從彥稱贊李侗：

“近有後生李願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趨向大抵近正”。（羅從彥：《與陳默堂書》）

同窗學友沙縣鄧迪也贊美李侗：

“願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  
（《宋史·李侗傳》）

李侗成爲開紫陽之道脉，傳先聖之正緒的導師。李侗是賢者不爲過。

朱熹被稱爲“賢者”，更爲後世所公認。他在南宋，歷高、孝、光、寧四朝，纍官樞密院編修、轉運副使、秘閣修撰、煥章閣待制、侍講等職。朱熹一生主張對內修政事、愛養民力，澄清吏治，勤儉治國。諸如爲山穀細民請賑濟和抑壓豪強高利貸盤剝；懲治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糾正有業無稅和無業有稅不合理現象；要求皇帝“正心術”、“存天理滅人欲”，廉政肅貪，治國興國。朱熹本身生活極儉樸，其門人黃幹在《朱子行狀》中

說：“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敢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他在傳道授徒時，與門人弟子共過艱苦生活：

“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宋史·朱熹傳》）

接待客人，他從不鋪張，據記載，有一次

“胡紘謁考亭先生于武夷。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則用姜醢浸三、四枚共食。胡至，先生遇禮不殊。胡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斗酒，山中未爲乏也’。”

朱熹希望整肅綱常風紀，制訂了許多禮教。對外，朱熹反對賣國投降，反對和議，主張攘夷狄。孝宗即位之初，朱熹上封事時，就大聲疾呼：

“夫金虜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其不可和也明矣……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夫復仇討賊，自強爲善之說，見于經傳者，不啻詳矣。”（《朱文公文集》卷11《壬午封事》）

朱熹尊師重道，對老師李侗極敬重，

“自李先生後，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于釋老之說



皆非。”（明周木：《延平答問序》）

銳意進取，終創閩學。在傳道中，在待人處世上，在爲官從政中，朱熹強調“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祇是一理”，一個人無論何時何地，也無論地位貴賤，都應當保持良好的道德操守。

“延平四賢”重道德修養、立紀綱勵風俗、愛民愛國的道德操守，極大地影響了福建的文明程度，促進了福建民智的開發和社會風尚的提高。宋元以來，福建許多地方士子尊師重道、敬業守職、知書達禮，百姓勤儉樂善、崇禮守法、見義勇爲、愛國愛民，美德世代相傳，蔚然成風，名人輩出。下面舉幾例予以說明：

“南平風俗……自有宋大儒迭出其間，而海濱鄒魯稱極盛焉。今雖年湮代遠，而入其邑乘，士食舊德，農服先疇，型仁講讓，先儒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重修南平縣志序》，民國版）

“建陽風俗淳樸……敬師而崇禮，不爲刻薄之行……宗族比閭之間，患難相維持，緩急相倚賴，穆然有古樸之風。”（《建陽縣志·風俗》，道光版）

“古用舊爲山洞……民頑俗獷，夙稱難治……自宋至今，士君子敦本務實，小人食勤嗇用，守朱紫陽遺訓，冠婚喪祭，猶存醇樸之風。”（《古田縣志·風俗》，乾隆版）“至朱晦翁避地至止，義文周孔之道，洋溢溪山，理學文章甲于他邑；而忠孝義烈之風至明季而大暢。”（《古田縣志·序》，乾隆版）

浦城人真德秀爲官剛正不阿，以敢言著稱，在朝不滿十年，奏疏達幾十萬言。他在奏章中指出：

“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言，用人不以才勝德。”他強調：“國之將亡不在敵國外，而在民心。”

他力主墾土養財，修明政治，整飭武備以自強，時時防患于未然。

建甌人魏行可，建炎間奉使

“見金人于澶淵，因留不遣，語其屬曰：‘人孰無死，爲國死猶生也’金人逼以仕不從，乃飲鴆死。”（《建甌縣志》卷31，民國版）

建甌朱子後裔朱浚，元兵下建寧時，當時福州守王剛中投降，

“朱仰天大哭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可受辱乎！’遂并飲藥死。”（《建甌縣志》卷31，民國版）

建甌人謝壁在宋理宗景定年間，時奸雄賈似道專權，衆多朝臣敢怒而不敢言，謝壁挺身而出，屢屢和賈似道進行論爭，挫擊了邪惡勢力的氣焰。元兵南下，沿途守鎮紛紛瓦解，賦閑家中的謝壁盡管已是頑疾在身，但

仍奮力募集起一支由1700人組成的義勇軍，浩浩蕩蕩北上抗元。朱熹三傳弟子文天祥，德祐年間奉使元軍，被拘，後浮海至溫州，擁立益王抗元。後文天祥兵敗被俘，慷慨就義。其崇高氣節和愛國主義精神，光照日月，浩氣長存。

閩學即朱子學，作為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存在有消極因素、封建性糟粕。如封建的三綱五常，《家禮》中繁多的禮節規定，父家長制的專橫規定，對婦女的種種限制，等等。這些都嚴重地束縛着人們的思想，壓抑了正常的人性。但是，“延平四賢”楊、羅、李、朱對閩文化發展的貢獻是巨大的，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他們那種結合社會實際傳道東南、創立閩學的精神，對前人的儒學思想及佛道思想的批判性整理總結、採納吸收的博大胸懷和寬容精神，尊師重道、敬業守職、堅持不懈發展文化教育的精神，積極入世、憂民愛國、高尚氣節的精神，重道德操守、崇禮守法、勤儉樂善的品德等等，在今天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中反對拜金主義，加強廉政自律，加強社會主義文明建設，都有積極的意義。

（1996年5月南平師專武夷文化研究會講座論題，7月福建省“閩文化與福建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收進《閩文化源流與近代福建文化變遷》文集）

# 下 卷